



曾亦 黄铭◎著

复旦中国哲学书系

董仲舒与 汉代公羊学

《公羊传》独尊于两汉，至清中叶而再兴，其于中国社会、政治之影响，远非其他经典可比。而董子为汉儒宗，其弟子世为博士而传且终汉晋之世，皆得立于学官。则《公羊传》之独尊，实尊董子之学也。

上海人民出版社

董仲舒与 汉代公羊学

曾亦 黄铭◎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仲舒与汉代公羊学/曾亦,黄铭著.—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复旦中国哲学书系)

ISBN 978-7-208-14332-6

I. ①董… II. ①曾… ②黄… III. ①董仲舒(前
179-前104)-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34.55
②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9382 号

责任编辑 毛衍沁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董仲舒与汉代公羊学

曾 亦 黄 铭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25 插页 4 字数 245,000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332-6/B·1253

定价 65.00 元

自序

爰自清帝避位，民国肇建，乃不遑他事，而汲汲于罢祀孔之典，废经学之业。“五四”以降，国人惟西学是尚，罪孔氏之徒，至于稍趋保守之现代新儒学，如熊十力、牟宗三等，亦攀缘西法，以为研究传统思想之津梁。近十数年来，国人研究西学之兴趣，渐舍形上之学，而转趋政治哲学，且适逢儒学之复兴，而吾国传统学术中，又以《公羊传》最近于政治哲学。故今日好言经世之学者，乃专宗《公羊》，其与近来学术大势之转移，实有莫大关系焉。

十余年前，余始治《公羊传》。其后撰写《春秋公羊学史》，迄今已历近十年矣。盖《公羊传》独尊于两汉，至清中叶而再兴，其于中国社会、政治之影响，远非其他经典可比。然清以前，《公羊》之颛门著述颇散佚，惟有何休注与徐彦疏，犹全本俱存。故惟赖此书，清人据以再兴斯学，而今人亦得稍窥汉学门径也。其后又得清末今文学者翼护，虽遭民初废经之厄，然公羊学终能重光于今世矣。

古人以《公羊传》传自子夏，其后公羊氏一门世世相传，至汉乃著于竹帛。考何休诸书，尤以“三科九旨”为根本，然其说实已具于董仲舒，盖公羊先师历代相传之秘要也。董子为汉儒宗，其弟子世据学官而传其学，且终汉晋之世，皆得立为博士。则《公

羊》之独尊，实尊董子之学也。今观《白虎通》一书，朝廷议礼订制，大致颇本于《公羊》，故今欲治《公羊》者，亦不得不推本于董子也。

此书盖据《公羊学史》一部，稍作节略而成。黄铭随余研治《公羊》有年，其博士论文即专治董氏，故余嘱其撰写第二章，其余诸章由某草就焉。

是为序。

曾 亦

于沪上四漏斋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春秋》学与两汉今古之争	1
第一节 《春秋》经与传	1
第二节 师法与家法:五经博士及其增设	47
第三节 今古文与今古学	55
第四节 四次今古之争	61
第二章 董仲舒之《春秋》学	81
第一节 生平与学术	81
第二节 《春秋》之辞	84
第三节 《春秋》之义及其天人思想	113
第四节 《春秋》微言与孔子改制	130
第五节 《春秋》决狱	150
第六节 公羊学笼罩下的《春秋纬》与《白虎通》	153
第三章 何休与《公羊传》注	176
第一节 通三统	179
第二节 张三世	226

第三节 异外内	233
第四节 宋均说“三科九旨”	248
 第四章 《公羊》之独尊与《左氏》之兴盛	256
第一节 《春秋》与《左氏传》	257
第二节 贾逵论《左氏》长义	270
第三节 杜预与《左氏传》之成立	281
 参考书目	328
一、春秋类	328
二、其他古籍类	329
三、研究著述	330

第一章 《春秋》学与两汉今古之争

第一节 《春秋》经与传

《春秋》既有经，又有传。孔子主要依据鲁史，可能还包括其他诸侯国的史记，或笔或削，寓褒贬之义于其中，如是而有《春秋》经。其后，又有解经之书，如《公羊》、《穀梁》、《邹》、《夹》之类，更后又有《左氏》，皆自视为解释《春秋》之“传”。诸传虽然颇为不同，不过，都假托于七十子后学，以为得圣人作《春秋》之大旨。自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公羊》、《穀梁》二传先后立于学官。

魏晋以降，《左氏》学日盛。至唐初修《春秋左传正义》^[1]，确立了《左传》在解释《春秋》中的独尊地位。不过，中唐以后，《左氏》之研究渐衰，于是有兼综三传之学风，甚至主张舍传求经。至清嘉庆、道光间，《公羊》学勃兴，尤其以刘逢禄、宋翔凤代表的常州学派，笃尚家法，而以颛门相高，并进而扩展到对其他经典的研究。

一、《春秋》经

案，《汉书·艺文志》云：“《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

此处所言《春秋古经》不同于《经》，大概《经》即《公羊》、《穀梁》所据之《春秋经》，记载鲁隐元年至哀十四年间之事，凡二百四十二年；至于《春秋古经》，疑为《左氏》学者所称之古文经，所记载史事至哀十六年“孔丘卒”为止，凡二百四十四年事。

相传孔子作《春秋》。然孔子以前，原本就有“春秋”之名。大概上古时，凡记事之书，皆可名为《春秋》。孔颖达《左传正义》云：

“春秋”之名，经无所见，唯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其君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

可见，至先秦之时，诸国史书多以“春秋”为名。

除孔氏所引书外，先秦古书已颇有言及“春秋”之书。庄七年《公羊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礼记·坊记》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此言鲁国有《春秋》也。又据《墨子·明鬼下》，周、燕、宋、齐俱有《春秋》。又，诸家多引《墨子》“吾见百国《春秋》”之说。可见，此时诸国俱有《春秋》。

此外，先秦时又有泛称“春秋”者。《管子·法法》云：“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山权数》云：“《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云：“《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霰霜不杀菽’，何为记此？”《战国策·燕策》载苏代语云：

“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著于《春秋》。”载乐毅语云：“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语云：“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晋语七》载司马侯语云：“羊舌肸习于《春秋》。”皆在孔子之前。据此，当时凡言诸国史记，俱名“春秋”矣。

大概“春秋”本国史之名，然其时私家著述，乃至后世史家，亦颇取“春秋”以名其书。先秦已有《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李氏春秋》等，此后，又有西汉陆贾《楚汉春秋》、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晋司马彪《九州岛春秋》、习凿齿《汉晋阳秋》、孙盛《晋阳秋》^[2]与《魏氏春秋》、檀道鸾《续晋阳秋》、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等，可见，即便后世之学者，犹以“春秋”名诸史也。

先秦时，诸国史记不独以“春秋”为通名，又别有专名者。《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至于魏，则有《竹书纪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则“春秋”者，又似为鲁史之专名。

孔颖达《左传正义》云：

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梲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

可见，孔氏盖以“春秋”为通名。刘知几亦曰：“然则《乘》与《纪年》、《梲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史通·六家》）据此，则诸国史记皆有《春秋》之大名，至于《梲杌》、《乘》、《纪年》之名，不过别号耳。

可见，先秦时“春秋”之名，实兼有二义，盖既为鲁史记之专

名，又为诸国史记之通名。然而，不论《春秋》为鲁史记，抑或诸国史记，俱为记事之书。直至孔子据旧史记而成《春秋》，“春秋”遂成一专名。且孔子作《春秋》，因史事而加王心，大异于记事之史，故公羊家谓《春秋》为经，实以《春秋》非仅详于史事，实别有微言大义存焉。

因此，孔子所成之《春秋》，固为专名。然其得名为《春秋》，当有不同于史记之义者。后世论孔子《春秋》之得名，大致有如下数说：

其一，错举四时为名。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孔颖达疏云：

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于夏，秋先于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

杜预虽属于古文经学，然其“错举”之说，则似乎实近理，故皮锡瑞（号鹿门）《春秋通论》亦以为“此说得之”。

其二，春生而秋成。《公羊传》徐彦疏云：

问曰：案《三统历》云：“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贾、服依此以解“春秋”之义，不审何氏何名《春秋》乎？答曰：《公羊》、何氏与贾、服不异，亦以为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说》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也。

案《左传》孔疏引贾逵语云：“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此说本出于刘歆《三统历》。《汉书·律历志》云：“歆察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且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礼义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刘歆、贾逵、服虔之说，似与杜预不同。然徐彦以《公羊》、何氏之说与贾、服不异，而谓《春秋说》亦然。盖春生秋成，万物受中以生，而人君动作亦当不失中，此先民共有之世界经验，宜乎今古文家所同也。

仅就此二说而言，孔子以“春秋”名其制作，取义殆同于诸国史记，似未见别有深义。故后世颇有学者别考“春秋”之深义者，有如下数说：

其一，以《春秋》当一王之法，其命名有赏刑、褒贬之义。郑樵云：“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又云：“一褒一贬，若春若秋。”此义盖出于《左传》襄二十一年与《周礼·春官》。

其二，与《春秋》成书时间有关，即春作而秋成。徐彦疏引《春秋说》云：“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然徐彦本人不同意此说，庄

七年疏云：“旧解云‘孔子修之，春作秋成，谓之《春秋》’者，失之远矣。”此说专以“春秋”得名系于孔子，然孔子前实有“春秋”之通名，则此说甚狭，尤未必合于旧史之义。此说虽出公羊家言，然与《公羊传》引“不修《春秋》”之文不合。

其三，“奉始养终”之说。此说出于《论衡·正说篇》，云：“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

其四，“与日月并行而不息”之义。此说亦出于何注。

哀十四年传：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何注：待圣汉之王以为法，乐其贯于百王而不灭，名与日月并行而不息。

徐疏：制作《春秋》之义，谓制《春秋》之中赏善罚恶之义也。《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有国家者最所急务，是以贯通于百王而不灭绝矣，故孔子为后王作之。云“名与日月并行而不息”者，谓名之曰《春秋》，其合于天地之利，生成万物之义，凡为君者不得不尔，故曰“名与日月并行而不息”也。

此说以《春秋》历春至秋，三时而成，然其“赏善罚恶”之功，则流播于千秋万世，春去秋来，生生不息。

二、公羊传

《春秋》文辞简约，若不通以传，则不过流水账簿而已，别无深意可寻，焉能成为儒家所尊崇之经？至于释经之传，则有《公》、《穀》、《邹》、《夹》等，其中以《公羊》陈义最高，且书法曲折，思辨入微，遂得先立于学官。观有汉一代之政治施設，虽颇仍秦

旧,然其大纲,毕竟由《公羊》绎出。其后两千年间,《公羊》虽未尽为独尊,学者亦不尽为颛门之学,然而,上至朝廷之议论,至于政治之规摹,下及百姓之日用,莫不体现了《公羊》之具体运用。

(一) 口说与载籍

孔子据鲁史旧文作《春秋》,而其微言大义,则口授之,至汉乃著于竹帛,斯为《公羊传》也。徐彦疏云:

孔子至圣,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

盖孔门弟子中,传经最有功者,莫过于子夏。《孝经·钩命诀》谓孔子“以《春秋》属商”,而此后传此经者,主要在公羊氏一门。故后儒将《公羊传》溯源于子夏,尚属近理。^[3]

至于孔子口传而不载籍者,徐疏犹据讖说,以为孔子避秦燔书之祸故也。然此说实出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以下简称《解诂》)。隐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传》云:“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解诂》云:

言无闻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

又,定元年,春,王。《公羊传》云:“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解诂》亦云:

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

《公羊传》说甚明，而邵公“辟害容身”之说，实可从中衍出。可见，自传、注、疏以下，皆以《公羊传》本于孔子口说，至于其中缘由，则因孔子避祸之故。

考《公羊传》一书，何休以为“齐人语”者，凡二十四处，惟“是月”一条为“鲁人语”。可见，汉人以《公羊传》为齐学，当属可信；且以口说的缘故，乃杂有齐人之语。如隐五年注云：“登，读言得。得来之者，齐人语也。齐人名求得为得来，作登来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庄二十八年注云：“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盖《公羊传》若早著于竹帛，则在其流传中，不至于杂有此类齐人语。

又，《春秋经》多有阙文，而《公羊传》常以“无闻焉尔”释之，此亦口说之证。故襄二年疏云：“《公羊》之义，口授相传，五世以后方著竹帛，是以传家数云无闻焉尔。”盖《公羊传》文体采用问答形式，足为口说之确证，其有阙者，不过弟子未能耳闻于师的缘故。

徐疏又引戴宏序云：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戴序叙述《公羊传》传授次第，最为明白。公羊家颇乐引其说，盖以师徒授受之确，足以证《公羊传》之真；至于《左氏》，“则师徒相传，又无其人”，故不得不崇尚文字。

《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曰：“名高。”此说至宋罗璧始有异论。罗璧《拾遗》云：“公羊、穀梁自训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

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然《四库提要》驳其说云：“邾为邾娄，披为勃鞞，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是有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又云：“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廖平因谓公、穀俱为卜之双声，羊、梁又商之迭韵，以为齐、鲁同音异字，实均子夏一人。

其实，《礼记·杂记》中即有“公羊贾”之人，或疑公羊贾即《论语》之公明贾，而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公明高，盖曾子弟子也，亦从子夏受经。盖羊与明音近，此说或可通。《汉书·古今人表》有公羊、穀梁列四等，必实有其人可知。

至于口说之载籍，徐疏据戴宏序，以为景帝时始著于竹帛。此说于《公羊传》文亦有证据。哀三年，《公羊》之经作“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开阳”，而《左氏》作“启阳”，徐疏以为，“开者，为汉景帝讳也”。可见，《公羊》著于竹帛，当在景帝时，或在景帝后也。又，案《汉书·外戚传》，景帝六年（前151年），立太子荣母为皇后，大行奏疏引《公羊》云：“‘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段熙仲以为，大行非博士，无与于口授，其所称引必据载籍也。可见，《公羊》著于竹帛，当在景帝六年前。又，《韩诗外传》文字多有与《公羊》同者，而韩婴与董子同时，则知《公羊》著于竹帛当不晚于此时。^[4]

《四库提要》以为，《公羊传》不尽出于公羊高，至于著竹帛，则悉本注、疏之说，以为“《传》确为寿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

（二）授受源流

《春秋》诸传中，《公羊》最早行于世。其授受源流，最初盖出于子夏。《史记·孔子世家》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孝经·钩命诀》云：“以《春秋》属

商。”商，子夏字也。董子《春秋繁露·俞序》载子夏语云：“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史迁《太史公自序》亦引子夏此语。徐彦谓孔子以《春秋》口授子夏，又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可见，子夏不独为《公羊》先师，实为传《公羊》之初祖。子夏之后，善言《春秋》者莫过于孟子。孟子以后，荀子论六经要旨，亦及《春秋》。

徐彦引戴宏《春秋说》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又，隐二年何休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皆以先秦传《公羊传》者，皆公羊氏一门。然《公羊传》中又颇记子沈子^[5]、子司马子^[6]、子女子^[7]、子北宫子^[8]、高子^[9]、鲁子^[10]之语，可见，先秦传授《公羊》者，殆未必尽出于公羊氏也。

汉景时，《公羊传》由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史记·儒林列传》云：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胡毋生老归教授于齐地，受其学者应当不少，然惟公孙弘以取汉相而显于世耳。

公孙弘，菑川薛人。武帝初，弘年已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后病免归。元光五年，复以贤良文学征，以策对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后位至丞相，爵平津侯。《汉书·儒林传》谓弘受胡毋生《公羊春秋》，本传则谓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汉志》著录有《公羊杂记》八十三篇，不知即《杂说》否？